

北京不同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状态研究

李 倩^{1,2,3}, 张文忠^{1,2}, 余建辉^{1,2}, 曹 靖^{1,2,3}, 党云晓^{1,2,3}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 要:利用北京2009年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各街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收入状况将调查人群划分成贫困家庭、工薪家庭和富裕家庭。采用隔离指数分析方法,研究北京47个街区3类家庭的居住隔离空间分布状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对隔离度值分类,提取出14个居住隔离显著的区域进行重点分析。结果表明,三环以内无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居住隔离现象从四环以外开始显著;富裕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相对较高,大多拥有自购商品房,而贫困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较低,一般居住在经济适用房和破旧民宅中;贫困、富裕人群聚集区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占用比例差异很大。

关 键 词:隔离指数;富裕人群;贫困人群;北京

1 引言

居住隔离属于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范畴。一般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平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特征类似的集聚于某一特定地区,不相似的团体彼此分开的现象^[1]。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根据美国城市的两级分化、居住隔离现象,形成了著名的3大古典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即伯吉斯(Burgess)的同心圆模式、霍伊特(Hoyt)的扇形模式和哈里斯(Harris)及乌尔曼(Ullman)的多核心模式。后来又有西方社会学者对北美城市进行生态因子分析,结论表明:社会等级、家庭类型和种族成分是居住隔离形成的主要因素^[2]。Harvey研究发现,居住隔离的产生不全是人们偏好选择的结果,更多的与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密切相关^[3]。Henderson等从经济学角度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认为家庭收入、财产和住房价格等是影响住房权属转换的重要因素^[4-5]。Boehm、Rosenthal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是住房权属决策的基本影响条件^[6-7],Haurin、Goodman、Rosenthal认为只有当家庭收入水平或预期水平达到一定水

平后,才会选择购买住房^[8-9]。

在国内,黄怡等从理论进行研究,归纳出我国城市居住隔离是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住宅市场化加剧以及财产权的确立的背景下产生^[10]。冯建和周一星利用“三普”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分析1982年和2000年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演化情况,结果表明,1982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2000年则趋于复杂,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提出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11]。顾朝林等认为北京的社会极化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受到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涌入的影响,其中农村流动人口是造成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12]。吴雅菲以上海市2006-2009年3个相同时间段的上海住宅租赁价格指数为基础,对上海外环线以内地区的居住空间分异现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上海居住空间整体上未出现严重分异,但以经济状况为标杆的居住空间分异出现端倪,贫富夹层居住隔离显著^[13]。陶海燕等运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构建出一套真实场景的居住决策模型,并

收稿日期:2012-01; 修订日期:201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77)。

作者简介:李倩(1986-),女,湖北仙桃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等。E-mail: liqian8623@126.com

通讯作者:张文忠(1966-),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等。

E-mail: zhangwz@igsnrr.ac.cn

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高收入居民集中在老城区中,贫困家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说明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对住宅区位的选择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14]。李志刚等把上海划分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和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6类社会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得出结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15]。余建辉等以北京2005年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生态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将被调查人群分为低潜力差现状人群、高潜力差现状人群、高潜力中现状人群、高潜力中现状人群、中潜力中现状人群和高潜力优现状人群五类,并划分出各类人群的集聚地^[16]。许学强等分别进行了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17]和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8]。吕露光以合肥市为例,运用隔离指数计算出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区域化分布现象确实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收入的差异这一客观原因,同时也是由于低收入者在心理上排斥与富裕人群同住在一起^[19]。

鲜有研究采用大规模全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对居住隔离地区人群的特征和居住现状进行探讨。事实上,居住隔离地区富裕人群和贫困人群在学历、职位、住房拥有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其聚居的区位、环境和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北京大规模宜居调查问卷,根据收入状况将调查人群分为贫困家庭、工薪家庭和富裕家庭3类,运用隔离指数法分别计算出各类家庭的居住隔离情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对隔离度值分类并进行微调,划分出贫困人群集聚区和富裕人群集聚区,用“学历”、“职位”、“住房拥有情况”和“住房产权”等社会属性解释各集聚区的人群特征,用各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比例解释人群集聚的原因。

2 研究区范围、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范围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区的范围主要是北京的8个主城区(即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全部129个街道和天通苑、回龙观、亦庄新城、通州新城和大兴黄村5个大型居住区,共134个街道。

论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9年北京大规模宜居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数据以北京市134个街道为单元,每个街道按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比例发放问卷,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便抽样、交通控制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对象控制为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不包括短期停留的群体。共发放问卷10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89份,根据问卷的质量,本研究选取了其中的3053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调查主体的性别、年龄、收入、区域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符合要求,问卷的数量和分布结构满足抽样设计和研究要求。为了使每个控制单元有足够的样本数量,本文对相邻的2~3个街道进行了合并,得到47个研究区域。

与以往类似研究数据相比,本文所采用的问卷数据包含了居民详细的收入、年龄、家庭人口、学历、住房条件等微观行为主体的很多属性信息,信息量较大。问卷中“家庭月收入”一项的选择设置为“3000元以下”、“3000~4999元”、“5000~9999元”、“10000~14999元”、“1500~19999元”和“2万元以上”5个级别;同时选取“学历”、“职位”、“住房拥有权”和“住房产权”4个社会属性变量,各属性类型分别下设自变量。用各街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比例表征居住的环境状况,主要包括:公交地铁、商店、医疗机构、邮电局、教育机构、餐厅和其他休闲娱乐^①。

本文根据收入状况将所有家庭样本划分成贫困家庭、工薪家庭和富裕家庭。通过计算,把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划分为贫困家庭,家庭月收入3000~9999元的划为工薪家庭,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划分为富裕家庭^②。所获得的样本

①公交地铁用站点数来计;商店包括大型超市和小型街边商店;医疗机构包括一二三级医院、卫生所、门诊、药店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餐厅包括大型酒店和有各自招牌有营业地点的餐馆等;其他娱乐休闲包括体育馆、广场、公园、文化艺术科技博物馆等。

②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10》对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统计,对低收入户的家庭月收入计算结果为3645.34元,高收入户的家庭月收入为11970元,为此结合调查问卷本文将贫困家庭定义为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家庭,富裕家庭定义为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家庭,工薪家庭定义为3000~10000元的家庭。

数据中,贫困家庭485份,工薪家庭2047份,富裕家庭521份。贫困家庭占总样本数的15.89%,工薪家庭占总样本数的67.48%,富裕家庭占16.63%。虽然广大的工薪家庭占主导地位,但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所占比重相对也较大,贫富差距现象比较显著。

2.2 研究方法

隔离指数是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常用的方法,用来计算不同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差异,揭示出某一社会群体和其他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离程度,计算公式为:

$$D = \frac{1}{n} \times \sum_{i=1}^n (X_i - Y_i)$$
 (1)

式中: D 指研究对象的隔离情况; X_i 指一个特定子群体在所选区域的百分比; Y_i 指出所选群体之外的其他全体在区域总的百分比。 D 的取值介于0~1之间, D 值越大,表示被考察对象的隔离程度越高。

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随机并且覆盖北京主城区的,而该公式对研究区的选取有针对性,比如有学者专门选取贫困区进行计算^[19]。而且,通过直接运用本公式的计算发现结果跟实际也不相符,因此需要对公式进行数学变换,变换之后的公式为:

$$D = \frac{1}{j} \times \sqrt{\sum_j^i (X_{ij} - Y_{ij})^2}$$
 (2)

式中: X_{ij} 指47个研究区域中一个特定子群体在所选区域的百分比; Y_{ij} 指出47个研究区域中所选群体之外的其他全体在区域总的百分比; D 为47个研究区最终分异度值。

3 实证研究

运用公式(2)分别计算47个街区的居住隔离度值,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数据分类并进行人工判读,将隔离度值分为3个区间段:1.0~0.8, 0.8~0.4, 0.4以下(图1),其中取值在1.0~0.8间的是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共得到14个街区(图2),即该区域存在明显的

表1 全体样本家庭月收入特征

Tab.1 Annual incom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sample families

人群类型	家庭月收入/元	问卷数/份	总计	有效占比/%
贫困家庭	3000以下	485	485	15.89
工薪家庭	3000~4999	896	2047	67.48
	5000~9999	1151		
富裕家庭	10000~15000	366	521	16.63
	15000~20000	91		
	20000以上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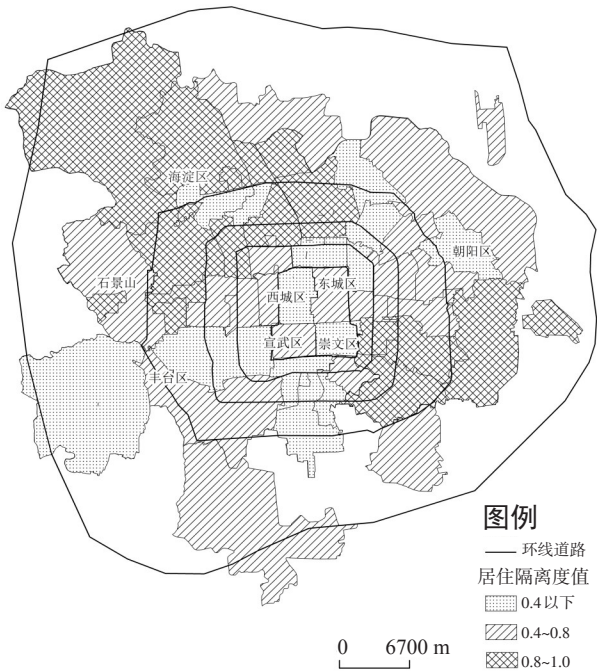


图1 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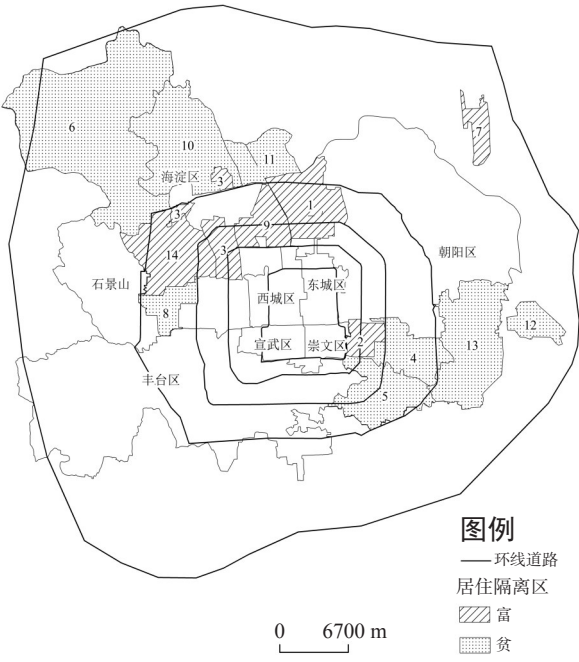


图2 贫富街区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seriou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rich and poor areas

贫富居住隔离现象,根据14个街区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所占的比例分别对这些区域进行分类,贫困家庭占比高的为贫困人群集聚区,共8个街区;富裕家庭占比高的为富裕人群集聚区,共6个街区。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三环以内无明显居住隔离现象,理论上讲,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好,交通便利,拥有良好的教育医疗机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完善,房价高,应该是富裕人群及高学历、高职位人群聚集的地区,但由于部分中心城区是老城区,还存在着一些大面积的老旧居民区,比如什刹海、大栅栏、新街口等街道,这些街道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房屋类型以平房为主,年代久远,房租相对便宜,根据权衡理论的思想,住户最佳居住区位的确定是通过将每日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与城市不同区位的级差地租作权衡而确定的,低收入者由于对通勤费用支付能力较弱,居住地的选择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往往只能局限在离工作地近的地方。因此这里又聚居着低学历、低职位的贫困家庭,导致中心城区贫富并存的现象,总体而言隔离情况均不明显。

居住隔离现象从四环开始显著,且贫困人群集聚区和富裕人群集聚区呈现明显的分离现象,富裕

人群主要集中在北四环(3)、五环(1、9、14)和东北六环(7)、东三环(2),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西五环(8)、西北六环(6、10、11)、东南五环(4、5)和东六环(12、13)^③。

3.1 富裕人群集聚区

富裕人群区主要集中在北四环(3)、五环(1、9、14)和东北六环(7)^④、东三环(2)。从表2可以看出,6个街区中学学历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均达到60%以上,表明富裕人群的学历都偏高;职位在中高层的比例均达到30%以上,表明富裕人群均从事较高职位;除了7号街区外,其余6个街区的购房人群比例都达到60%以上,由于7号街区为首都机场,工作人

表2 富裕人群集聚区人群属性变量的比例(单位:%)
Tab.2 The proportion of attribute variable in rich areas

街区	大专及以上学历	中高层	购房	商单比
1	64.65	42.62	63.27	77.08
2	70.59	46.67	66.00	95.24
3	72.62	40.22	67.68	72.05
7	85.73	33.33	42.86	63.78
9	83.89	40.63	67.05	83.43
14	73.47	42.50	72.92	73.33

注:“商单比”为商品房和单位房占总样本的比例。

表3 14个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比例(单位:%)
Tab.3 The propor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街区	贫富	公交地铁	商店	医疗机构	邮电局	教育机构	餐厅	其他休闲娱乐
1	富	14.80	13.66	16.67	12.50	12.10	14.09	15.33
2	富	10.62	14.29	10.64	22.79	10.48	16.40	9.00
3	富	21.71	14.91	9.57	22.06	20.77	18.24	23.33
7	富	0.12	0.00	0.00	0.00	1.61	0.92	0.67
9	富	15.38	15.53	14.54	19.85	16.94	12.01	19.33
14	富	7.88	14.97	10.67	8.41	16.45	9.70	8.67
小计	富	70.50	73.35	62.09	85.62	78.35	71.36	76.33
4	贫	5.80	4.35	7.80	3.41	5.48	6.93	4.00
5	贫	4.06	11.12	6.70	2.94	5.68	8.58	8.45
6	贫	1.80	0.62	2.84	2.21	0.81	1.62	3.33
8	贫	4.99	7.14	9.22	3.32	5.15	6.70	2.00
10	贫	4.85	0.62	3.90	1.47	1.61	0.46	1.33
11	贫	4.57	0.62	2.48	0.74	0.30	0.23	1.33
12	贫	0.17	0.31	1.42	0.20	0.20	0.20	0.55
13	贫	3.25	1.86	3.55	0.15	2.42	3.93	2.67
小计	贫	29.50	26.65	37.91	14.38	21.65	28.64	23.67

注:比例的计算以14个街区的总样点数作为基数。

③文中编号与图2中贫困人群集聚区和富裕人群集聚区的编号相对应。
④7号街区为首都机场,人群工作性质和所处地理位置均特殊,因此属性变量和基础设施情况与其余富裕地区不同。

员的流动性较大,因此购房比例不高;富裕人群住房产权性质为商品房和单位房的比例均达到60%以上。

从表3看出,富裕地区除7号街区外,公交地铁的比例均达到7%以上,商店的比例均达到13%以上,医疗机构的比例均达到9%以上,邮电局的比例均达到8%以上,学校的比例均达到16%以上,餐厅的比例均达到9%以上,其他休闲娱乐设施的比例均达到8%以上。从总比例上看,6个富裕地区占用了70.50%的公交地铁,73.35%的商店,62.09%的医疗机构,85.62%的邮电局,78.35%的学校,71.36%的餐厅,76.33%的其他休闲娱乐设施。富裕人群不仅占用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而且占据了大量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享受好的教育医疗机构和休闲娱乐场所等,富裕街区均建有多处高档别墅,别墅配套设施发展完善,与经济适用房、保障房等居住环境相差很大。

1、2号街区富裕人群集聚与朝阳区CBD的快速发展有关,受到奥运会的影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都有很大改善。1号街区为奥运村、大屯、亚运村等地区,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都较好,有2条地铁线路经过,加上有河流经过,购物方便,又占据距离首都机场近的优势,且建有多处别墅,如鸿华高尔夫庄园、紫玉山庄别墅、紫庐别墅小区、碧海方舟小区、绿城北京诚园、亚运新新家园、国奥村和富城花园别墅等,吸引了大量中高收入阶层在此居住。2号街区为劲松街区和潘家园街区,有2条地铁线路经过,主要为改革开放建设较早的小区,但老旧街区基本已改造升级完成,社区建设很有特色,人文色彩浓厚,配套设施齐全,建有有富力公馆、双井北里别墅、首府别墅和山水文园西园等别墅,占据涉外商务使馆区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商业区白领和海外人士落户,造成该地区富裕人群集聚。

3、9和14号街区在海淀区。3号街区主要为紫竹院街道、海淀街道等,该区地处中关村,主要住户是中关村新贵和IT白领。9号街区主要为学院路街道、花园路街道等,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著名学府,该区依托良好的人文教育氛围吸引了一批高科技产业在此集聚,高学历、高收入的居民所占比重较高。14号街区主要为四季青镇、万泉河路等,自然风光良好,有西山公园、信达垂钓园、圆明园、颐和园和燕园高尔夫俱乐部

表4 贫困人群各属性变量的比例(单位:%)
Tab.4 The proportion of attribute variable in poor area

编号	高中及以下	普通职员	购房	经济适用房、其他
4	90.00	95.62	36.67	80.00
5	44.44	93.33	29.41	75.00
11	56.60	90.95	64.26	88.10
6	44.74	91.17	55.56	84.21
8	80.00	90.18	65.79	90.45
10	59.21	96.67	52.70	60.32
12	63.33	91.43	73.33	88.46
13	64.29	92.34	81.67	84.62

注:“其他”包括城中村,破旧民宅等自建房。

等;该街区为西山别墅区,有万城华府别墅、龙湖颐和原著和西山美墅馆,凭借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休闲度假场所吸引了大批富裕阶层。

3.2 贫困人群集聚区

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西五环(8)、西北六环(6、10、11),东南五环(4、5)和东六环(12、13)。表4为贫困人群的属性变量的比例,8个街区中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比例均达到44%以上,表明贫困人群的学历都偏低;职位为普通职员的比例均达到90%以上,表明贫困人群绝大多从事低职位;而购房的比例则呈现不规则分布,这与各地的人群特征有关,4、5号街区的购房比例低,因为该地为小红门、十八里店等地,该地各种商贩批发集聚,贫困人口较多,以外地打工为主,因此购房的比例较低,以租房为主,6、8、10、12、13号街区多为城乡结合部,人群以北京本地离退体的老年人为主;形成了较多的城中村和破旧民宅,因此租房的比例不高,大多是自己的房子,住房产权为经济适用房和其他的比例较高,均达到75%以上。

从表3看出,贫困集聚区公交地铁的比例不足6%,商店的比例除5号街区外最高不足8%,医疗机构的比例最高不足8%,邮电局比例最高不足4%,学校的比例最高不足6%,餐厅的比例最高不足9%,其他休闲娱乐的比例最高不足9%。从总比例上看,8个贫困地区仅占用了29.50%的公交地铁,26.65%的商店,37.91%的医疗机构,14.38%的邮电局,21.65%的学校,28.64%的餐厅,23.67%的其他休闲娱乐设施。贫困街区数量较富裕街区多,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富裕街区;通过调查发现,大型商场超市在富裕街区集聚,而贫困街区主要为小型超市或小卖部等;三甲医院

在富裕街区居多,贫困街区以卫生所、一般医院为主;知名高校和中小学多在富裕街区,贫困街区以职业技术学院和一般中小学为主且数量少;大的酒楼餐厅多在富裕街区集聚,为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服务,一般餐厅和饭馆多在贫困街区;休闲娱乐场所和著名景区多在富裕街区,贫困街区只拥有少量的体育馆、公园等。贫困街区多为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或破旧民宅,小区都处于四、五、六环,地铁线除了昌平线延伸到6号街区,亦庄线延伸到5号街区外,其余贫困街区都没有地铁经过。虽然公交费用便宜,但交通拥堵现象严重,治安差,物业管理混乱,且相关配套设施跟不上,与富裕地区的居住环境相差极大。

4、5、13号街区在朝阳区。4号街区主要为双井街道、王四营乡和垡头街道等,属城乡结合部,曾是北京五大工业基地之一国有化工企业聚集地,随着北京炼焦化学厂、北京染料厂、首钢铁合金厂等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转制搬迁,该区逐步转变成以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农村占地转居人员、城区拆迁居民为主的居住小区。有染料厂经济适用房、王四营保障房、通惠家园等,该地区污染严重,道路拥挤,交通堵塞,绿地面积少,公共服务设施多功能不足且陈旧简陋。5号街区主要为十八里店地区、小红门地区等,由于本身为商贩集聚地,因此商店数量较多在贫困街区较高,比例为11.12%,贫困人口较多,以外地打工为主,有宋家庄经济适用房、众诚廉租房、万科红狮限价房等。该地人口流动性大,居住环境恶劣,脏乱差现象严重,同时也是犯罪案件高发地区。13号街区主要为豆各庄地区、黑庄户地区、管庄地区等,有豆各庄经济适用房、东柳经济适用房、东坝廉租房、朝阳广渠路限价房、管庄经济适用房和建东苑经济适用房等。为刑事案件高发区之一,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受到通勤的制约以及工作机会的缺乏,中青年人口较少,以北京本地老年人口为主,形成了较多的城中村和破旧民宅。

6、10和11号街区在海淀区。6号街区主要为苏家坨镇、温泉镇等街区,有苏家坨经济适用房、温泉镇限价房等。属城乡结合部,地块偏远,居民分布散乱,农业人口比例较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比例均较低,且以贫困老年人口为主。10号街区主要为西北旺镇、马连洼街道等。有回龙观经济适用房、佰嘉经济适用房、朱辛庄限价房和清河小营限价房等。该地为人口流动性大,人群多在城区

工作,交通拥堵,基础设施落后,安全隐患高。11号街区主要为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等,属城乡结合部,建有天通苑经济适用房,是北京人口密度最大的居住区之一。由于缺乏城市的配套设施,交通拥挤,每天有流量巨大的钟摆式交通往返于北京城市内部与该地区,造成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缺乏适合其人口规模配置的绿地、广场等安全避难场所,安全治理较低。

8号街区在石景山区,主要为田村路街道、八宝山街道等,有衙门口经济适用房、石景山廉租房等。这是外地流动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多为老旧小区,配套设施发展不足,绿地面积缺乏,安全隐患高,抢劫案件时有发生。

12号街区在通州区,有通州廉租房、通州半壁店限价房、通州棚户区等,为大型居住区之一,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存在大量非法商户和制假窝点,造成环境脏乱,秩序混乱,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隐匿其中,治安状况堪忧。

4 研究结论和展望

通过对北京47个街区居民隔离情况的研究,表明:①北京三环以内的街区居住隔离指数较小,收入差异总体不明显。②通过对居住隔离指数较大的14个街区进一步分析表明,高收入聚集的区域有6个,主要分布在:奥运村、大屯路、亚运村附近、劲松街区、潘家园街区、紫竹院街道、海淀街道、学院路街道、花园路街道、四季青镇、万泉河路等街道,这些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建有较多别墅,高学历,高职位人群数量较多。③低收入聚集的区域有8个,主要分布在:双井街道、王四营乡、垡头街道、十八里店地区、小红门地区、豆各庄地区、黑庄户地区、管庄地区、苏家坨镇、温泉镇、西北旺镇、马连洼街道、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通州居住区等。这些地区多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老旧房屋大量存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等较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安全隐患大,治安较差,聚集着北京本地离退休的老年人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低学历,低职位是该区域人群的主要分布特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居住隔离现象越来越显著,居住隔离现象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时也是导致社会各阶层封闭化和社会矛盾产

生的原因,居住隔离彰显的贫富差距,使得贫困人群普遍感觉到了一种相对剥夺感,心理上的不平衡一旦达到临界点,必将产生社会冲突。同时,在居住隔离的状态下,平民社区的居民之间持续地相互影响,并形成一定的亚文化。当社区中充斥着毒品、犯罪、贫困、单亲母亲时,社区的下一代也将沿着相同的途径走下去,这一切使得这些社区非常可能产生持续的失业、贫困和犯罪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全社会来说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负面效应,而对于这一地带的治理,政府往往要付出很大甚至是几倍的经费支出和人力,才能换来短期的社会秩序稳定,这就为政府的治理增加了难度。此外,由于居住隔离的影响,各个阶层之间的交往接触极少,不能共享彼此的价值观念、闲暇生活等,阶层之间差异性进一步被强化,彼此难于沟通和对话,长此下去,城市中的不同阶层之间互相漠视甚至对立,就像是一盘散沙,这是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因此,对居住隔离现象的控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隔离现状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对已形成的隔离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很少。居住隔离的加剧和贫富分异的形成,都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居住隔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对于解决居住隔离日益严重的问题,很多学者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混合居住的政策,虽然欧美混合居住的实践开展得较为深入,但国内尚无实例研究,且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也很少,一般而言,在混合居住的社区内,通过公共住宅和商品住宅的同时开发,在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促成“公益性”的公共住宅和“盈利性”的商品住宅共生共存。这种方法主要强调,通过政府介入,借助市场力量,在房地产开发的市场利益和非盈利的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在推进混合居住的城市发展策略中,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一个纯粹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里,在土地级差价格的推动下,混合居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混合居住的邻里中,不同阶层居民在物质空间的接近,是否就一定带来文化、价值层面的融合,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首先应该开展居民对于混居模式接受程度的调研工作,根据实际需求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参考文献

- [1] 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的模式: 兼析上海居住隔离的现状. 城市规划学刊, 2005(2): 31-37.
- [2] Shevky E, William M. The Social Areas of Los Angeles. Richmo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 [3]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sil Blackwell Lt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1-120.
- [4] Henderson J V, Ioannides Y M. A model of tenure cho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 98-113.
- [5] Henderson J V, Ioannides Y M. Owner occupancy: Investment vs. consumption deman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7, 21: 228-241.
- [6] Boehm T P. Tenure choice and expected mobility: A synthesi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1, 10: 375-389.
- [7] Rosenthal. Income and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owner-occupied housing in the UK: Evidence from pooled cross-sectional and time-series data. Applied Economics, 1989, 21: 761-775.
- [8] Haurin D R, Gill H L. Effects of income variability on the demand for owner-occupied hous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7, 22: 136-150.
- [9] Goodman A C.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housing price, permanent income, tenure choice and housing deman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8, 23: 327-353.
- [10] 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及其研究进程. 城市规划学刊, 2004(5): 65-73.
- [11] 冯建,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1982-2000). 地理研究, 2003, 22 (4): 465-482.
- [12] 顾朝林, C·克斯特罗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1997, 52 (5): 385-393.
- [13] 吴雅菲. 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城市规划应对策略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14] 陶海燕, 黎夏, 陈晓翔. 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空间格局演变的真实场景模拟. 地理学报, 2009, 64(6): 665-676.
- [15]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211.
- [16] 余建辉, 张文忠.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居民群体空间自相关分析. 地理研究, 2010, 29(5): 820-829.
- [17] 许学强. 广州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5-399.
- [18] 李郁, 许学强. 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 人文地理, 1993, 9(3): 27-36.
- [19] 吕露光.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贫困人口分布状况研究: 以合肥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04(6): 74-77.

Research on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Beijing

LI Qian^{1,2,3}, ZHANG Wenzhong^{1,2}, YU Jianhui^{1,2}, CAO Jing^{1,2,3}, DANG Yunxiao^{1,2,3}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urba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remarkable. Living segregation is not a simp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it also leads to social conflicts, and thus controlling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ecomes an urgent task.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paper aims to describe the living segregation in Beijing and analyze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a wide-scope resident investigation of Beijing in 2009, taking the residents on each block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local famil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income levels: Poor Families, Working Families and Wealthy Families. After using isolation index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living segregation of these families, and extracting the seriou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rea by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eriou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areas inside the 3rd Ring Road, while the segregation phenomenon become obvious outside the 4th Ring Road. Then through dividing the segregation areas into six rich-gathering areas and eight poor-gathering areas by the proportion of each kind of famili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ch-gathering areas get more bette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where most of the people get higher education, better jobs and own houses themselves, while the people in poor areas get lower education, low-ranking jobs and mainly rent houses except those having old houses.

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living segregation in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mainly about the living status and the cause of the isolatio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al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living segregation and its solution are not mature, which will be an urgent topic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solation index; rich-gathering areas; poor-gathering areas; Beijing

本文引用格式:

李倩, 张文忠, 余建辉, 等. 北京不同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状态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693-700.